

# 历史地理视野下的泗州城市水患及其原因探析<sup>〔\*〕</sup>

陈业新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泗州起始于北周,唐时迁治汴河入淮口,与临淮同城而治;宋初临淮移治,泗城成为地跨汴河两岸的城市,并因漕运之兴而繁盛一时。然泗城自迁治汴口起,即有水患之忧。唐至清康熙年间,泗城存世950余年,共有30年次发生了水患。但就序列分布来看,前期水灾次数很少,唐至明正统初的700余年间,泗城水患“百年一遇”;乃后,泗城水患显著增多,特别是明万历以降时期。同时,其水患发生又有相对较为集中的特征,万历二十年前后和康熙十八、十九年间严重水患的连年发生,最终导致泗城沉于水下。泗城水患,主要是因淮水泛滥而致。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淮河中下游地区降水充沛但变幅大,区域河湖众多,泗城所在的汴口一带地势低洼等,是泗城发生水患的客观自然因素;而明清黄河治理策略及其实施所致的洪泽湖水位增高,则是其间泗城水患次数增多、破坏程度加大的社会原因。在自然、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泗城最终于康熙年间永沉洪泽湖底。

〔关键词〕灾害地理;等级序列;水灾;泗州城;明清时期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5.017

## 一、引言

“泗州”之名,滥觞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初治宿预(今宿迁东南);唐长安四年(704),在运道通济渠入淮汴口设临淮县;开元二十三年(735),泗州迁治临淮。泗州“地当水口,为南北御要之所”,<sup>〔1〕</sup>唐朝每年经由通济渠运输的漕粮多至数百万石,泗城藉此发展为运河沿线重要城市,<sup>〔2〕</sup>商业繁荣。<sup>〔3〕</sup>北宋定鼎开封,朝上军政开支和京师日用,主要仰赖汴河漕运。<sup>〔4〕</sup>景德三年(1006),临淮移治徐城驿(今泗洪临淮镇),<sup>〔5〕</sup>泗

州从此成为地跨汴河两岸的城市。<sup>〔6〕</sup>赵宋承平日久,随着经济的发展,泗州人口数量不断增长,<sup>〔7〕</sup>泗非望郡,<sup>〔8〕</sup>但在全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sup>〔9〕</sup>北宋时,保障京师物资之需的水运独依汴河为重,<sup>〔10〕</sup>加之其佛教颇盛,运口城市泗州一片繁盛,以致日本和尚成寻将泗州比于杭州。<sup>〔11〕</sup>但泗城所在的汴河系人工运河,其水源主要为大河黄水,北宋汴河因此始终存在泥沙淤积的问题,虽经浚治,<sup>〔12〕</sup>但北宋一朝,汴水淤浅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sup>〔13〕</sup>久淤不治的汴水因塞浅不畅,严重地影响了通航能力,<sup>〔14〕</sup>汴渠漕运日渐萧条。南

作者简介:陈业新,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地理、环境史、灾害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ZS164)、重大项目(18ZDA196)的阶段性成果。

宋建炎二年(1128),宋军为阻止金兵南下,人为决河,全河之水经泗水等河尽入淮河,东流付海。受此影响,泗城水患频仍,环境恶劣。元代定鼎大都,为保障京师供给,修凿京杭大运河,自隋而宋繁忙的汴水运道渐遭废弃,昔日繁盛但缺乏农业、手工业坚实基础的泗城也因此衰颓。明清时期的泗州,受人为(如倭寇与火灾等)、自然(水灾与风灾等)等破坏影响,州城屡有埋坏,虽中经反复修缮,城池得以苟延,<sup>[15]</sup>但在水患的连续冲击下,存世近千年的泗城最终于康熙年间沦为“鼃窟穴”。<sup>[16]</sup>

## 二、泗城水患的基本情状

### (一)历史时期泗城水患资料整理

出于考察泗城历史水患之需,笔者全面查询了如《旧唐书》《帝乡纪略》等文献,<sup>[17]</sup>整理出唐至清初950余年的泗州水患史料。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此前文献不曾记载但见诸后世文献的水患事件,因缺乏相应的印证文献支持,对后者载记的水患,本文不做统计。<sup>[18]</sup>另外,文献中记载的水患,有些是关于泗州城的,有些则为泗州地区的,泗州城、泗州地区是点、面关系,历史时期的区域水患较为复杂,有些水患发生于泗州地区,其范围固然较大,但不一定对泗城造成危险;<sup>[19]</sup>而泗城发生水患,通常泗州地区也是水潦颇大,但也并非完全如此。所以,在整理史料和统计时,一定要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区别,否则会产生误解。

### (二)泗州水灾资料等级量化处理及其结果分析

为便于对泗城水患的分析,根据地理学、灾害学研究的要求,<sup>[20]</sup>本文对文献中记载的水患文字进行必要的等级化处理,结合区域水患特征,按灾情轻重,将泗州水患分为6级:1级为泗州地区一般性水灾。如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泗州水害民田”。<sup>[21]</sup>2级为泗州地区大水患。如明嘉靖十一年(1532),“大水,至十一月方落”。<sup>[22]</sup>3级为泗州地区特大水患。如唐大中

十二年(858)八月,“徐、泗等州水深五丈,漂没数万家”。<sup>[23]</sup>4级为泗州城市一般性水患。如宋开宝七年(974)六月“己亥,淮溢入泗州城”。<sup>[24]</sup>5级为泗州城市大水患。如崇祯四年(1631),“淮水秋涨,由北堤入城,官民庐舍圯,人多流散”。<sup>[25]</sup>6级为泗州城市特大水患。如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sup>[26]</sup>

另外,泗州地区发生的特大水患,泗城通常难免罹灾,从水患等级划分方面来说,此情状下的3级和4级甚至5级当合并为一。但是,有时候由于防护及时,泗城因而有惊无险,最终安然无恙。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并兼及级则“量”的对应性,泗城水患也分别划为3个级则,即4、5、6级。

兹据量化结果(见下页表1),对历史时期泗州水患统计和等级序列分布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

其一,关于灾次。从开元二十三年(735)移治临淮始,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泗州城完全沉于河底止,泗城存世共951年。其间,泗州地区先后遭罹水患101年次,其中泗州城市水患30年次。

其二,等级序列分布分析(见下页表2)。

(1)开元二十三年至正统元年(1436)共702年,水患27年次。此间时间长度占泗城存世时间的74%左右,但水患次数仅占其总年次约27%,灾害百年发生率约3.85%。其中泗城水患7次,灾频可谓“百年一遇”。

(2)正统二年至正德二年(1507),计71年,水患6年次,水患百年发生率约8.45%,虽较此前时期水患频率有所增加,但平均12年发生1次水灾,相对而言仍是灾害少发。而6次水灾中,泗城水灾占一半,泗城水患频率由此前百年1次升至百年4次,说明泗城受水灾影响的几率在增加。

(3)正德三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计91年,水患52年次,水患百年发生率为57%,水患频次增加迅猛。此间又以嘉靖十五年(1536)为界,其前28年,水患8年次,百年灾害率约28.6%;此

表1 历史时期泗州地区、泗州城市水患等级量化结果

年份	等级	年份	等级	年份	等级	年份	等级	年份	等级	年份	等级
764	1	1162	3	1511	5	1552	2	1579	4	1629	4
787	2	1164	5	1517	3	1555	2	1580	5	1631	5
792	6	1172	1	1518	4	1558	2	1581	4	1632	3
833	2	1209	2	1522	1	1561	2	1584	2	1649	6
858	3	1241	6	1526	2	1563	2	1585	1	1659	3
863	2	1266	4	1528	2	1564	2	1586	2	1662	2
974	4	1299	2	1532	2	1566	5	1587	1	1665	1
978	4	1307	5	1536	2	1567	2	1589	2	1666	1
979	2	1330	2	1537	2	1568	2	1590	2	1670	2
980	2	1386	2	1538	2	1569	2	1591	6	1672	2
990	1	1437	5	1539	2	1571	2	1592	5	1679	6
994	1	1438	2	1541	2	1572	2	1593	5	1680	6
1014	1	1441	5	1542	2	1573	1	1594	5	1681	2
1034	2	1460	4	1543	2	1575	2	1595	4	1682	1
1057	3	1471	2	1545	2	1576	2	1596	4	1684	2
1061	2	1473	2	1546	2	1577	4	1597	4	1685	6
1118	3	1508	1	1551	2	1578	2	1598	1	合计	101次

表2 唐至清初泗州水患序列分布情况

序号	起讫年代	年数	水灾次数 (年次)	水灾次数的等级分布情状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1	735—1436	702	27	5	11	4	3	2	2
2	1437—1507	71	6	1	2	/	1	2	/
3	1508—1598	91	52	6	31	1	7	6	1
4	1599—1628	30	0	/	/	/	/	/	/
5	1600—1685	57	16	3	5	2	1	1	4
合计	/	951	101	15	49	7	12	11	7

后63年,水患44年次,百年灾害率约69.8%,为前者的2.4倍。而且,91年间的15年次泗州特大水患和泗城水患中,有12年次集中发生于后一阶段,而以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万历二十六年为多,尤其万历五年(1577)至九年、十九年至二十五年,是泗城严重受灾最为集中阶段。

(4)万历二十七年至崇祯元年(1628)共30年间,泗州无水患记载。这一现象的出现,或为真实情况的反映,或与文献记载有关。

(5)崇祯二年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计57

年,水患16年次,水患百年发生率虽不高(约28%),但泗州特大水患和泗城水患所占比例较大(50%),特别是康熙十八(1679)、十九年的泗城特大水灾,对泗城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湮没后果,而康熙二十四年的泗城特大水患,最终导致泗城彻底湮沉水底。

总体上看(见表1),作为泗州地区的一部分,泗城水患与泗州地区水患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有三个集中发生阶段,即764—863、974—1307、1437—1685年,三个阶段合计683年,泗城水患29

年次,其时间和水患年次分别约占泗城存世时间和总水灾年次的72%、97%。第三阶段中的1577—1581、1591—1597、1629—1631、1679—1685年,是泗城水患密集发生期,其中1579—1581、1591—1597、1679—1680年等年份,泗城连年水患。从趋势上看,文献记载的泗城水患年次具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增多的特征。以世纪为单位进行年次统计的结果显示:8世纪1年次、10世纪2年次、12世纪1年次、13世纪2年次、14世纪1年次、15世纪3年次、16世纪14年次、17世纪6年次。可见,从15世纪开始,泗城水患年次稍有增加;到了16世纪,泗城水患年次增长甚剧,灾害年次大大超过此前6个世纪的受灾总年次之和,其水灾集中发生情形可见一斑;17世纪灾次虽然较16世纪的灾害次数有所下降,但考虑明万历中后期和天启年间近30年、康熙中期10余年,合计近50年的无灾记载,那么我们说,17世纪也是泗城水患频繁发生时期。

其三,从水灾等级折射的灾害强度来看,除文献记载的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六月<sup>[27]</sup>一次泗城特大水患(6级)外,泗城早期仅有的另2次水患都不是很严重。但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泗州等地发生大水患<sup>[28]</sup>开始,泗城5级水患次数较前有所增加,其中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的泗城水患至特大等级。明清时期,泗城5级以上的水患次数增加明显:明朝10次,清前期4次,均为特大水患,其中1591—1594、1679—1680年为泗城严重水患连年发生的两个集中时段,成为泗城毁灭性命运的转折点。如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的泗州大水,淮河水位高于泗城,城内“因塞水关以防内灌。于是,城中积水不泄”,“州治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sup>[29]</sup>这是一次影响很大的水患,复以泗城外此后3年连续“大水”,<sup>[30]</sup>城内积水不得外泄,泗城“自是水患益甚”,累年困于淫水,“州城沮洳,民不可居,士民强半避居乡村,所存者,惟州卫官数员及守城卒役数人而已,然犹出入船舫,巢居城阜,听断于堤边馆驿,审比于城上门楼”。<sup>[31]</sup>而康熙十八、十九年的水灾,则最终

导致泗城从此成为水下城市:“康熙十八年(1679)冬十月,水势汹涌,东北石堤溃决,口七十余丈,池水四溢,城外居民抱木而浮。其时堙门筑塞,日暮,城西北隅崩,计数丈,外水灌注如建筑,人民多溺死”;“十九年(1680)夏六月,淮复大涨,高出堤者数尺,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官若浮鸥,百姓尽奔盱麓、乡村,若鸟兽散,今仅余南关外一线外堤数十丈而已。州署置数楹于堤内东北隅,若营若卫,若东西厅,沿堤龛舍,数武之内,与编户杂处”。泗城自此“竟无消涸之期,永为鼃鼃窟穴”,城市“内外一派汪洋,无复畛域”,“内外河道舟楫往来无阻”,“城日见其倾,已成具区”,泗城“仅存城池旧名矣”。<sup>[32]</sup>有学者认为,自康熙十九年起,“洪泽湖内防洪能力最强的泗州城便被彻底破坏了”,<sup>[33]</sup>学界也多将该年作为泗城完全湮废的标志。

### (三)泗城水患类型分析

通过对30年次泗城水患的梳理,可将其水患分为三大类型:(1)具体原因不明,文献仅书作“水”“大水”之类者,共3年次。(2)黄河南泛洪水直接导致者,有2年次。(3)由淮水引发者,共25年次,但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大气降水导致的淮水溢灌泗城,计3年次;二是具体原因不详所致淮水涨淹泗城,共22年次。<sup>[34]</sup>

从水灾类型的次数统计看,历史上的泗城水灾绝大多数是由淮水泛滥引起的,其灾次数量占泗城总水患次数的8成以上,文献对此记载也非常清晰。如唐贞元八年(792)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没泗州城”;宋开宝七年(974)六月,“淮水溢入泗州城”;宋嘉祐二年(1057)七月,“淮水自夏秋暴涨,环浸泗州城”<sup>[35]</sup>等。但另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导致淮水泛滥之因有二,即大气降水和其他不明原因,而后者年次尤多,达22年次,其年次占泗城水患总年次7成以上;二是从时间分布序列来看,此类不明原因导致的淮水溢灌泗城事件,从南宋后期开始明显增多,而以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降较为集中。

### 三、泗城水患原因分析

#### (一) 降水充沛但变幅大

古泗城遗址在今江苏盱眙县淮河镇境内, 位处淮河中游, 为北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区域, 冷暖空气交替频繁, 降水充沛, 气候湿润。但受东亚季风影响, 其降水具有年内降水不均、年际差异较大的特征, 极易导致洪涝灾害。据统计, 1918—1985年, 盱眙年均降水约 904.7 毫米; 1957—1985年, 年降水量在 1000 毫米以上者有 14 个年份, 几乎占总年份一半, 其中 3 个年份降水超过 1200 毫米。但其年际降水量差别程度不一。最大降水量与最小降水量的比值, 1918—1949 年为 3, 1950—1985 年为 1.7。受梅雨影响, 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1957—1985 年的降水资料显示, 其年内四季降水各占全年降水总量的比重为: 春季 3—5 月 19.3%、夏季 6—8 月 51.3%、秋季 9—11 月 21.3%、冬季 12 月至次年 2 月 8.1%。尤以 6—7 月最为突出,<sup>[36]</sup> 单月降水量可至 700 毫米以上,<sup>[37]</sup> 一天最大降水量甚至超过 200 毫米。<sup>[38]</sup> 这种雨水丰沛、年际和年内降水分布不均但又集中于夏季的降水状况, 极易导致区域性水患。

另一方面, 盱眙所在的淮河上、中游地区降水也具有夏季集中、年际与年内降水差异较大的特征, 且上、中游同时出现暴雨的几率较大。<sup>[39]</sup> 域内较大水灾的形成, 都与其降水变幅大且集中有关。据吕炯等研究, 淮域年均降水量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3.3 倍。研究者以 1916、1921、1931、1950 年 4 个降水较多而致灾的年份为例, 通过对上游信阳、中游正阳关等地 4 个年份的降水资料梳理、分析, 对流域的水灾进行了考察。笔者据其研究, 将相关数据整理成表 3。从表 3 统计不难看出, 流域年内降水主要集中于 6—8 月, 周口等 6 地此间降水均超过 500 毫米; 而 7 月各地降水尤为突出, 信阳等地 7 月降水都在 450 毫米以上, 徐州、寿县、六安 1950 年 7 月的降水量分别约为年均的 3 倍、2.5 倍、1.9 倍; 1931 年 6 月 17 日—7 月 25 日, 上游信阳、中游正阳关等地降水量都在 500 毫米之上。而 1950 年 6 月 26 日—7 月 16 日短短 20 天的时间, 新蔡等地降水量也都超过 500 毫米, 占全年降水的 80%~90%。<sup>[40]</sup> 这种降水集中且降水量大的结果, 不仅直接导致了当地的水灾, 也间接助推了其下游地区水患的发生及其影响程度的加剧。

表 3 1916、1921、1931、1950 年夏季淮河流域各地降水量(含距平)

站点	降水量(毫米)			
	6—8月(距平, 年)	7月	1931年6月17—7月25日	1950年6月26—7月16日
漯河	/	/	/	263.5
周口	743.2(+406.9, 1931)	273.2	/	/
	/	/	/	331.4
信阳	1078.9(+631.4, 1931)	630.1	851.8	/
息县	/	/	927	/
潢川	/	/	967.3	/
新蔡	834.3(+355, 1931)	320.6	559.2	/
	/	/	/	634.5
正阳关	739.4(+358.5, 1931)	490.9	566.9	/
	/	/	/	578.1
寿县	375(+35.4, 1950)	278.6	/	328.7
六安	426.6(+88.5, 1950)	287.2	/	297.5
蚌埠	856.9(+453.2, 1921)	376.9	/	/
	720(+319, 1931)	488.1	507.5	/
	/	/	/	523
徐州	638.2(+270.3, 1916)	268	/	/
	966.9(+599, 1931)	283.5	440.4	/
	637(+269.1, 1950)	431.8	/	433.7
盱眙	749.7(+311.1, 1921)	390.3	/	/
	918.6(+469, 1931)	712.7	747.5	/

## (二)“地势洼下”

泗州古城位于今洪泽湖西南地区,地势低洼。据地质学界研究,该地区处于扬子地台的东北部,距今约1亿年的中生代晚期,区内发生强烈地壳运动并脱离海洋环境。受此影响,区内发育了三个方向的构造带。淮河就是在这—地质地貌的背景下发育的,淮河之滨的泗州古城就处于洪泽凹陷区西南部。<sup>[41]</sup>另外,江苏地震局等单位1954—1980年连续水准测量发现,其间苏北出现以洪泽湖为沉降中心的地形形变,表明洪泽凹陷处于持续沉降过程中。早在秦汉时期,受黄泛间接影响,淮河洪泽凹陷区内的河段时常泛滥,河床两侧泛滥盆地形成如万家湖等常年性湖沼。<sup>[42]</sup>同时,淮水面阔水深,加之泗州古城距海不远,<sup>[43]</sup>李唐时期,体型硕大的海鱼可上游到今盱眙一带,<sup>[44]</sup>且海潮时常倒灌,<sup>[45]</sup>导致泗城受灾。<sup>[46]</sup>

传世文献也对泗州地势低洼的情况有较多记载。《明史》载称“泗州,祖陵在焉,其地最下”;<sup>[47]</sup>万历时,泗民在其上疏中亦称泗城“逼临淮湖,最为低洼”,“每遇时水,街市水深数尺,房垣恒被淹塌”;<sup>[48]</sup>明末清初,泗州大量民田为水所没。康熙六年(1667),州守袁象乾《申请蠲豁荒沉田粮公移》文中称“泗州地形洼下,众流汇归”,水患多发。<sup>[49]</sup>

泗州城遗址现在地面高程多为12~12.5米。<sup>[50]</sup>那么,明清泗城地面高程究竟几何?有学者认为在5米左右。<sup>[51]</sup>然另有研究表明,彼时泗城地面高程远不止5米。1966年大旱,当地民众发现“城墙根”,盱眙文史学者曾对明祖陵和泗城遗址进行了踏勘。研究者根据现场考察,结合文献记载,经与祖陵地面高程比对,得出泗城原地面高程为6.22~7.05米。<sup>[52]</sup>1970年代中期,盱眙修建淮河大桥。施工者先在淮河镇小周滩(标高13.5米左右)近主淮河边高程6.7~8.1米处钻孔发现碎砖、瓦片、石块、烂木料等,随后又在小周滩、二淮河外及芦苇滩等处钻孔发现了大量石块、砖瓦、木材、兽骨等。或认为这一地带当为泗州城墙及房屋遗址。<sup>[53]</sup>有研究者据此而得出

泗城原有地面高程为6.7米左右的结论。但另一方面,论者又据《明神宗实录》所载万历十九年泗州水患材料,以及《河防一览》有关此次泗城水患消退情况的奏疏等,推测泗州公署地面高程应是6.02米。如此一来,根据钻探资料得出的泗城原地面高程(6.7米)与根据文献记载推出的泗州公署地面高程(6.02米)不尽一致。论者的解释是“可能城内地面略有起伏,不能用很精确的一个数字代表”,因此而将泗城地面高程确定6.7米±0.7米,并强调该结论尚“待泗州城发掘的进一步验证”。<sup>[54]</sup>那么,这一结果真实性如何呢?—则材料可喻之。1950年代,淮河镇农户在城根村北部淮河大桥头东北渔场挖土,该处原地面高程11米,挖深至2.5米时,发现淤泥下层为一层干燥、结实的黑粘土。研究者认为粘土可能是人工填筑的,或为明朝填城的实证。<sup>[55]</sup>果如是,则可对泗城原地面高程作—简单的推判:挖掘处地面高程为11米,填土位于地面以下约2.5米处,即当年此地经填城后的地面高程为8.5米。根据万历《帝乡纪略》,万历时期的填城始于二十三年,藏于二十六年五月,填土深度4、5尺不等。<sup>[56]</sup>按照明代营造尺1尺约32厘米的标准折算,<sup>[57]</sup>万历填城高度为1.28~1.6米,平均1.44米,则泗城高程约为6.9~7.22米,平均高程约7.06米。这一结果,与6.7米±0.7米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 (三)“淮壖泽国”

整体来看,河湖众多是淮北重要的地理特征之一。<sup>[58]</sup>明清时的泗州境内河湖较多,<sup>[59]</sup>文献对此多有描述。如《中都志》:泗州“南瞰淮水,北有汴泗”;《帝乡纪略》:“泗州北枕清口,南带濠梁,……水陆都会之地。……山水朝拱,……南据长淮,……陂湖映带,汴、泗周环,……诸水会聚”。<sup>[60]</sup>因河湖众多,泗城为之环绕,泗城遂有“淮壖泽国”“水国”之谓。<sup>[61]</sup>北宋诗人秦观“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霏间。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诗句,即形象地勾勒了泗城所处的水环境情状。<sup>[62]</sup>尤其沿淮—带地势低洼,

湖泊较多。<sup>[63]</sup>明清方志记载了其时泗州河湖的分布状况。<sup>[64]</sup>透过其所载,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泗州彼时河湖状况及其变迁情况。

首先,河湖数量方面,除淮河、汴河、洪泽湖外,泗境先后存续河流有如一字河等7条、湖泊如沙湖等34个,但实际远不止此。一则文献明确记载说“泗境前志所载,泗之为湖者五十有二”,<sup>[65]</sup>还不包括河流;二则一些“不可以道里计者”即面积较小的湖泊未被纳入载记之列,此类湖泊仅有其名者就有万家湖等16个;<sup>[66]</sup>三则有些湖泊为季节性的,也就是夏季蓄水即成湖,但又为“农不可耕、人不可居之地”,此类季节性湖泊因其数量多、分布广而无法统计,故地方志书未将这类湖泊纳入记述内容。<sup>[67]</sup>

其次,空间分布方面,除一字河分布在城东外,其余河湖均位于城北、西两方,其中西方(含西北)有潼河等24河湖、北方(含东北)有城子河等16河湖,这些河湖彼此通连。诸湖大小不一,其中志书明确记载其大小且周围在数里以上者,就有陡湖(长20里、阔3~4里)等15个。各湖距州城也有远近差异,近者如沙湖仅数里,远者如黑东湖则为150里,但距州城数十里者居多。同时,诸湖存现时间亦不一,或如影塔湖等始终存在,或如沱沟湖等后来消失了,有些则如雁门关湖等乃后来新出现的。不少河湖冬涸夏涨,蓄水功能显著,在水势突发的时候,可一定程度上减缓洪潦对州城的冲击,但泗城地势低洼,一旦水势过大,这些蓄含洪水的河湖连成一片,<sup>[68]</sup>对州城来说,又是巨大的灾害隐患。因此,众多的河湖不仅经常性地贻患泗城,同时也是泗州地区土地荒芜、社会萧条不可小觑的原因之一。<sup>[69]</sup>

最后为洪泽湖。据学界研究,洪泽湖原为浅水小湖群,唐代始有今名。自南宋黄河南泛夺淮入海后,在黄水及其携带泥沙沉积和历次治黄等自然、人为等因素的一并影响、作用下,既有的小湖群逐步扩大为洪泽湖,并随着高家堰等湖坝的筑修及堤坝的日益升高(见表4),<sup>[70]</sup>其蓄水高度

也不断增加,<sup>[71]</sup>导致地势低洼的泗城频繁发生水患。对此,《帝乡纪略》云:“泗之患水者,一曰淮,一曰河,一曰湖。而不知湖之患则以淮涨之,淮之患则以河逼之。然河不特阨,清口下流如归仁集以东,实当州境左臂。而嘉靖间亦曾自怀远涡口冲决入淮,目今黄埭南徙,倘一旦下壅上溃,与淮湖汇成一派,即分导稍平,恐亦难保其终也。”<sup>[72]</sup>这种情况引发的泗州水患,是导致明清时期淮水溢灌泗城的主要动因。

表4 明清时期高家堰坝高变化情况

时间	地点	地面以上高	地面以下深	折今坝高
万历元年(1573)	大洞口	1丈	1丈	6.4米
万历七年(1579)	高家堰	1.3丈	1丈	7.4米
康熙十九年(1680)	武家墩	1.6丈	大于4丈	大于17.9米

总之,泗州地区河湖众多,年内降水不均、年际差异较大,复以地势低洼等因,自移治临淮之日起,泗城就有水患之忧。康熙《泗州志》载:“泗之从来夙称水国,地势窪下,闻诸父老,言唐李淳风建城时,卜泗终有覆盆之忧之说。”<sup>[73]</sup>此说虽有附会之嫌,却道出了自然地理与泗城水患间的事实关系。明清时期,因治河之需,不断加高洪泽湖大坝,不仅导致泗城水患增多,而且也加大了水患破坏程度。(笔者将另有专文陈述)对此,《帝乡纪略》记曰:“本州坐临淮水之堦,有汴、直等河,沙、安等湖大小五十余脉,每遇秋霖夏潦,必至泛涨,浸灌城郭,淹没田园。近年黄河亦由泄于淮,是以灾伤之告,无岁无之。”<sup>[74]</sup>在自然、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泗城最终在康熙年间永沉洪泽湖底。

#### 注释:

[1]《太平寰宇记》卷16《河南道十六·泗州》,《四库全书》第4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3页。

[2]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唐]白居易:《柳经李褒并泗州判官制》,《白氏长庆集》卷51《中书制诰四》,《四库全书》第1080册,第546页。

[4]《宋史》卷93《河渠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16、2321页。

[5][31][67]万历《帝乡纪略》卷3《舆地志》，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第189、268-269、226-227页。

[6]康熙《泗州通志》卷7《城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8页。

[7][宋]王存等：《元丰九域志》卷5《淮南路》，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1-199页；《宋史》卷88《地理志四》，第2178-2182页。

[8]泗州为“上”州，等级偏下。《元丰九域志》卷5《淮南路》，第196页；《宋史》卷88《地理志四》，第2180页。

[9]韩桂华：《宋代泗州地理经济变迁》，（台湾）《史学汇刊》2011年第28期。

[10][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1《河道》，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页。

[11][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6《欧阳修观行状异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57页；[日]成寻：《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王丽萍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3、246、252页。

[12]黎沛虹等：《北宋时期的汴河建设》，《史学月刊》1982年第1期；吴海涛：《北宋时期汴河的历史作用及其治理》，《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3][宋]沈括：《新校正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胡道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50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8《神宗》，《四库全书》第318册，第226页。

[14]《宋史》卷94《河渠志四》，第2329页。

[15]成化《中都志》卷3《城郭》，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63页；万历《帝乡纪略》卷3《建置志》，第300-303页；康熙《泗州通志》卷7《城池》，第85-86页；康熙《泗州志》卷5《城池》，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第71-72页。

[16][32][73]康熙《泗州志》卷5《城池》，第71-72、74-75、77-78、76-77页。

[17]《旧唐书》卷19上《懿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54页。[宋]姚铨：《唐文粹》卷76《记己·灾沴一》，《四库全书》第1344册，第181-182页。《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32、935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185《宋仁宗》，《四库全书》第315、317册，第761、112页。《宋史》卷3《太祖本纪三》、卷4《太宗本纪一》、卷5《太宗本纪二》、卷10《仁宗本纪二》、卷12《仁宗本纪四》、卷61《五行志一上》、卷65《五行志三》、卷356《任谅传》，第41、59、95、198、247、1320-1321、1325-1328、1330、1421、11221页。[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9《宋孝宗二》，《四库全书》第328册，第969页。《宋史全文》卷23下《宋高宗十九》，《四库全书》第331册，第266页。《元史》卷35《文宗本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90页。《明英宗实录》卷41、87，正统三年四月庚午、六年十二月己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明实录》校印本，1962年，第804、1745-1746页；《明宪宗实录》卷98、126，成化七年十一月丙午、十年三月壬子，第1863、2411-2412页；《明孝宗实录》卷219，弘治十七年十二月丙寅，第4120

页。[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4《河决之患》、卷61《江陵柄政》，《四库全书》第364册，第467、755页。《崇禎长编》卷62，崇禎五年八月癸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校印本，1962年，第3590-3591页。《明史》卷20《神宗本纪一》、卷28《五行志一》、卷29《五行志二》、卷84《河渠志二》、卷87《河渠志五》、卷223《潘季驯传》、卷233《张贞观传》、卷248《李若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7、448、453、467、2056、2058、2120、2121、5871、6083、6421-6422页。[明]潘季驯：《治河节解》，《明经世文编》卷377《宸断大工录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92页。成化《中都志》卷7《文章》，第341页。万历《帝乡纪略》卷1《皇恩志》、卷2《特使志》《钦使志》、卷3《舆地志》《建置志》、卷6《灾患志》、卷7《宦绩志》，第131-133、135-139、145、152、179-180、266、302-303、772-782、887、892页。康熙《泗州通志》卷3《星野》、卷7《城池》、卷21《名宦》、卷22《人物》，第54-63、65、88、204、208、215、232页。康熙《泗州志》卷3《星野》、卷5《城池》、卷8《职官》、卷14《名宦》、卷18《艺文》，第43-53、74-75、77-78、135、200、203、209、259、266-267、292-294页。康熙《睢宁县志》卷9《灾祥志》，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第340页。乾隆《江南通志》卷54《河渠志》，台北：（台湾）京华书局，1967年，第984页。光绪《泗虹合志》卷19《杂类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47、648页。[清]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柯锐等整理，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第421、428、431、434、482、520、590、597、600、602、609-610、612、616-617页。

[18]如《淮系年表全编》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泗州淮水溢。是年辛丑，水及城圆砖顶”。[清]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柯锐等整理，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中国水利史典·淮河卷一》，第428页。

[19]如《宋史》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泗州水害民田”。《宋史》卷61《五行志一上》，第1325页。

[20]参见陈业新：《1960年代以来有关水旱灾害史料等级量化工作进展及其述评》，《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2期；《历史时期水旱灾害资料等级量化方法述论——以〈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21][28]《宋史》卷61《五行志一上》，第1325、1330页。

[22][72]万历《帝乡纪略》卷6《灾患志》，第779、770页。

[23][27][44]《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第935、932、938页。

[24]《宋史》卷3《太祖本纪三》，第41页。

[25]康熙《泗州通志》卷3《星野·祥异附》，第57页。

[26]《明史》卷84《河渠志二》，第2056页。

[29]《明史》卷28《五行志一》、卷84《河渠志二》、卷87《河渠志五》、卷233《张贞观传》，第453、2056、2121、6083页；《明史纪事本末》卷34《河决之患》，第467页。

[30]万历《帝乡纪略》卷1《皇恩志》、卷2《钦使志》、卷6《灾患志》，第132、136-137、180、781-782页；《明史》卷84《河渠志



二》、卷223《潘季驯传》，第2058、5871页。

[33][54]张卫东：《洪泽湖水库的修建——17世纪及其以前的洪泽湖水利》，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106、110页。

[34]这一统计、分类结果和有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杨达源等曾从淮河流域洪涝灾害的洪流来龙去脉角度，将流域洪涝灾害分为三类：A类洪流来自淮河自身，起因于当地连日暴雨或连阴雨；B类为黄河与淮河俱发洪流；C类是黄河决口，洪水殃及淮河。参见杨达源等：《近2000年淮河流域地理环境的变化与洪灾——淮河中游的洪灾与洪泽湖的变化》，《湖泊科学》1995年第1期。

[35]《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第932页；《宋史》卷3《太祖本纪三》、卷61《五行志一上》，第41、1327页。

[36][38]盱眙县志编纂委员会：《盱眙县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130-131、133、134、134页。

[37]其1931年7月的降水就达712.7毫米。参见吕炯等：《淮河流域的水灾和旱灾》，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治淮汇刊》第2辑，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办公厅，1952年，第2页。

[39]中央气象台：《淮河流域降水分析报告》，《治淮汇刊》第4辑，1954年，第10页。

[40]吕炯等：《淮河流域的水灾和旱灾》，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治淮汇刊》第2辑，第1-10页。

[41][42]景存义：《洪泽湖的形成与演变》，水电部治淮委员会：《淮河水利史论文集》，1987年，第109、113页。

[43]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45][唐]李翱：《李文公集》卷18《来南录》，《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189页。

[46]文献记载的泗城第一次严重水患就是在淮域连续降水和海潮倒灌一并作用下发生的。参见[唐]吕周任：《泗州大水记》，《唐文粹》卷76《记已》，《四库全书》第1344册，第181-182页。

[47]《明史》卷87《河渠志五》，第2120页。

[48][74]万历《帝乡纪略》卷10《纶奏志》，第1256、1263页。

[49]康熙《泗州志》卷18《艺文》，第257-258页。

[50][52][55]洪德聪：《泗州城》，政协江苏省盱眙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盱眙文史资料》第4辑，1987年。

[51]吴宗越：《水漫泗州300年》，《水利天地》1999年第1期。

[53]洪德聪：《泗州城》，政协江苏省盱眙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盱眙文史资料》第4辑，1987年；张卫东：《洪泽湖水库的修建——17世纪及其以前的洪泽湖水利》，第28、106页。

[56]万历《帝乡纪略》卷3《建置志》、卷4《祠祀志》，第

313-316、328、338、386-387、405-406页。

[57]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07页。

[58]胡焕庸：《淮河水道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6年，第10-71页；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7-118、161-187页。

[59]康熙《泗州通志》卷1《图考》，第22-23页。

[60]成化《中都志》卷1《形胜》，第125页；万历《帝乡纪略》卷3《舆地志》，第235、239页。

[61]康熙《泗州通志》卷7《城池》，第101-102页；康熙《泗州志》卷5《城池》，第76页。

[62][宋]秦观：《淮海集》卷10《泗州东城晚望》，《四库全书》第1115册，第474页。

[63]光绪《泗虹合志》卷3《水利志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9页。

[64]成化《中都志》卷2《山川》，第142-143页；万历《帝乡纪略》卷3《舆地志》，第222-225、262页；康熙《泗州通志》卷5《山川》，第73-75页；康熙《泗州志》卷4《疆域》，第63-64页。

[65]康熙《泗州通志》卷5《山川》，第75页；万历《帝乡纪略》卷3《舆地志》，第226页。

[66]万历《帝乡纪略》卷3《舆地志》，第225-226页；康熙《泗州通志》卷5《山川》，第75页；康熙《泗州志》卷4《疆域》，第64-65页。

[68]康熙《泗州通志》卷1《图考》，第28-29页；张卫东：《洪泽湖水库的修建——17世纪及其以前的洪泽湖水利》，第66页。

[69]《泗州通志》：“泗之为湖者五十有二，……其他不可以道里计者尚多名类，所以一经夏潦秋霖，小大汇注，远害禾稼，近薄州城，为泗患也”，泗“淮甯泽国，……郡称凋敝，民鲜盖藏，而环城水绕，即倚河伯为金汤，……泗之西北……等处，一望黄茅白草，杳无人烟”。康熙《泗州通志》卷5《山川》、卷7《城池》，第75、101-102页。

[70]张卫东：《洪泽湖水库的修建——17世纪及其以前的洪泽湖水利》，第107页。表4高家堰坝高情况，仅为一家之言，此外还有其他研究结论。参见徐士传：《洪泽湖大堤高程变化史考》，《淮河志通讯》1984年第4期。

[71]徐士传曾对明清不同时期洪泽湖年最高水位进行了初步的推算，其结论是：792年为6.98米、1307年为7.10米、1441年约9.47米、1649年约8.64米、1683年约13.41米。徐士传：《洪泽湖的年最高水位考》，《淮河志通讯》1986年第2期。

[责任编辑：陶婷婷]